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之路

——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观谈起

马 妮

〔摘 要〕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念提倡一种文化的自知之明,即一种知此、知彼、知彼此的文化反思过程,这也是在对自己和他人的文化了解的基础上完成文化认同、承认文化差异、寻求文化对话路径的过程。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观昭示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化创新是在对传统文化真正认识的基础上对当代文化环境和发展方向的探索。要实现文化创新,就必须葆有文化反思的思维意识,在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融汇中寻求文化发展空间。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自觉;文化创新;费孝通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B77);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007);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450091202129)

〔作者简介〕马妮,1978年生,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吉林 长春 136000),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吉林 长春 130033)。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3)03-0042-04

一、文化自觉:作为反思意识的文化创新基础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概念,来源于他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所做的闭幕发言。“文化自觉”的理念代表着费孝通长期对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出路的思考。费孝通对中国文化的未来的忧思是围绕着一个重要问题展开的:在西方文化的日益进逼之下,中国文化是会保持其固有的身份和特点,还是会逐渐失去自己的特色而淹没在西方文化的浪潮之中?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只要中国人依然保留自己原有的文化认同,而不是简单地转向认同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就会延续自己的香火和生机。正是在构筑和巩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实现中国文化吐故纳新之途径的意义上,“文化自觉”的必要性得以呈现。

费孝通把“文化自觉”定义为一种对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把握这种“自知之明”的本质意义是汲取“文化自觉”观的思想养分、创新和发展中国文化的钥匙。“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所谓自知之明,

不仅是对自己文化的知晓,而且还包括知此、知彼、知彼此。知此,就是指对我们自己民族和国家文化自觉历程的了解;知彼,就是指对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化自觉历程的了解;知彼此,就是指对双方文化理解基础上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在承认文化差异基础上对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向的思考。

在这种“知己、知彼、知彼此”的意义上,“文化自觉”构成了一种文化反思意识。“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2〕}所以,文化自觉,不仅是对古今中外文化内容、文化模式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们对文化发展变化的反思意识,是对过去文化模式的思考。把握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观的关键之处首先在于体悟这一点。

我们不当在文化反思的路途中仅仅停留在对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的反思,而是还应该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对文化思维方式反思,这样的自我反思才是更彻底、更纯粹的文化自觉。只有形成对文化思维方式的反思意识,才能达到对自己的文化的最澄明的洞察;只有这种对文化意识的自





觉,才是真正对文化历史、文化现象的反思;只有意识层面上的文化自觉,才能为文化创新提供持久不断的正能量和推动力。

二、文化自觉:指引文化创新方向的路标

文化自觉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前提。在历史上,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省察,都是在外来文化传入并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汉唐时代佛教的传入与流行,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这些都发生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危机时刻和转型时刻。离开危机之下对文化的自我反省,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就不可能安然度过这些承上启下的重要时刻。与中国的情况相类似,西方的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同样是以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不断克服接踵而至的危机,不断把文化发展导向新方向的过程。西方文化经历了从古希腊的理想主义,到罗马的实用主义,到现代的理性主义,再到反理性、反同一性、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复杂历程。检视西方思想文化演变的每一个关节点,同样可以发现,每一个文化发展新方向的开辟,都离不开文化思想界的名士与哲人对文化传统的总结与反思。

可以说,虽然中西方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取向有明显差别,但是,它们的传承和创新都离不开在社会转型期对文化的主动的自我反思。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三点:一是文化自觉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进行的反思。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每一次文化自觉的形成都发生在民族发展的紧要关头,西方社会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莫不如此,其目的就是要反思本民族或国家今后的文化与社会发展方向;二是文化自觉存在着视阈和境界问题。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早期的文化自觉只能将反思置于“知己”这一视阈内,可以说早期的文化自觉都是地域内的文化融合,多数是以本国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各美其美”者多,能“美人之美”者少。譬如在中国,直到19世纪随着鸦片战争失败导致国门洞开,中西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才颇有“知己”、“知彼”的意味,但远未达到“知彼此”的境界;三是文化自觉凸显于社会动荡和社会形态转型期,但并不意味着文化自觉只存在于此,文化自觉是一种人们头脑中一直存在的意识。

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已十余年,这期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世界正在经历着百

年来重要的社会转型,欧盟的经济危机,福利制度的变革,其深层蕴含的是文化问题。金融危机牵动着西方文化的又一次变化。当初的默克尔与萨科齐拯救希腊的计划不仅仅是金融政策,它还是一种文化政策,是代表浪漫主义的法国和代表思辨逻辑的德国联手尝试救治日益老迈的传统欧洲文化的尝试。当前,除了其内在的危机,欧洲本土文化还面对着强势的美国文化的有力冲击。与困局中的欧洲相类似,当下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关节点。十年来,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国学的复兴,如何应对欧美日韩文化的涌入,是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严峻课题。中国当代文化将走向何处?这是需要文化自觉的时刻,也是中国当代文化创新的时刻。

在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节点上,我们应该自觉到当代文化内容的变迁、文化形式的更迭,自觉到当代文化形式变化的速度之快和当代文化样态更替的频率之快。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新的世界格局下,以对今天的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为基础,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促进中国文化的又一次腾飞。这是我们探讨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的目的所在。如果说中国的前几次文化自觉历程都来源于外来文化的引入,那么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文化自觉要更多思考的是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要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开启新时代中国文化创新的大幕。

三、文化自觉:理解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路径

经济之于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带来了我国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文化生产与消费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消费文化的过度膨胀,庸俗文化的沉渣泛起,以及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等等。光怪陆离的文化景象既使我们感到深深困惑,又在不断提醒我们,这是应该唤醒文化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急需文化自觉的时代!我们应该敏锐意识到,当文化反思的时机已经成熟。当下的文化自觉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前行方向无比重要。以此把脉当前中国文化现状,我们的文化创新应该围绕以下路径展开:

第一,文化创新不是挥刀断绝绵延的文化血脉,而是以“固本”为基础的“开新”。

文化自觉是一种文化自我危机感。综观历史,每逢人类前进的关键时刻,文化自觉总是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意识问题而存在。换句话说,每一次文化



自觉都是文化创新的开始,每一次文化创新都是文化自觉的产物。需要注意的是,每一次文化创新不是断然与原有文化割裂,而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之上的发展,“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文化本性。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已提出过的综合创新论,20世纪4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动态论》中提出的文化整体性问题,都涉及文化的创新与文化传承的关系问题。他们的文化的历史统一性观念,也是我们开展文化创新的思想基础。

所以,处理好文化的延续性问题,是成功的文化创新的应有之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革命,不会是断然地抛弃历史,而都是历史的延续和继承。断然抛弃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传统的文化必然失去存在的根基,要么不为人民接受,要么无法长期存在。中国五千年历史,其一以贯之的就是中国文化精神,此种文化精神也是贯穿于历次文化自觉历程之中,并确保新文化形式存在发展的重要因素。“继承性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的继承性这么强的。”⁽³⁾任何断裂性的文化革新都是不切实际的,都将走向失败。文化创新则是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发展,我将其称为文化的“查漏补缺”。“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还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对立了起来;文化不仅仅是‘除旧立新’,而且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⁴⁾

文化的延续性不等于文化复归。延续性和复归不是同一个问题,延续性是文化创新的内在因素,文化创新要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地域内实现,就要找到与当地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因素的契合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就是极好的例证。而“文化复归”则是一种新时代里文化模式的倒退。传统文化精神是宝贵的,它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魂与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就在于对一种文化精神、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但是,既然“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就意味着文化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无条件地主张原有文化内容的复归在逻辑上势必是一种文化倒退。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斯图亚特王朝,还是近代中国的张勋复辟,不仅是文化模式的倒退,而且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

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⁵⁾

第二,文化创新不是不加鉴别的齐头并进,而是在国家的文化政策导向之下的差别化发展。

当前,多形态文化的共生与杂陈状态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景观的突出特点。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化和下里巴人的市井文化,都有自己的广大市场和广泛受众。这种状况给我们的文化创新工作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一方面,在我国,由于农村人口是绝大多数,文化创新的指向就不仅仅局限于精英文化,它还应该把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草根文化也涵盖其中,形成农村文化、传统文化和都市文化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本身的确存在着境界与层次的高下问题,扶植与培养文化向高层次方向发展,始终应该是在文化创新中应该坚持的方针。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今日中国的文化多元化充分自觉的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文化政策,在文化创新中引导文化的差别化发展。

互联网的迅猛普及造就了“网络文化”。网络文化是一种新型的速食文化,它常常借助于网络,把人物、事件、观点在短时间内快速翻炒,使其迅速成为风潮,风潮过后,却没有沉淀下来的价值。网络文化的特点是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大,参与群体大,求新、求异、求怪,这些特点说明网络文化模式必然是速食的、形式化的、商业化的。近些年来颇为流行各种相亲节目、选秀节目,某些网络语言的爆红,甚至一些由于不正确发音而出现的流行语,都是这种速食文化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现象也是我们文化反思的对象,其大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时代符号,标明这个时代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但不具有流传价值。有价值的文化内容是在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它们是文化的精髓。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肤浅的文化只能博人一笑,终将被历史淘汰。

在此,文化自觉凸显出双重意义,它不仅是对文化危机的意识,同时也是对新的文化模式的忧思,即对文化未来发展的自觉意识和对当下文化样态的批判反思。“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⁶⁾文化自觉将发挥一种筛选





作用,使经典文化在历史中流传,使速食文化在历史中“留影”。

第三,文化创新不是封闭式的自我“怡情”,而是以全球化为竞技场的竞逐、交融与创生。

当前,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全球化既是文化的危机,也是文化的“利好”。在危机的意义上,全球化浪潮中的各国文化都会遭遇外来文化的竞争,弱势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排挤;在“利好”的意义上,全球化过程中新颖的外来文化元素的进入,为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提供了可能。全球化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是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和良好的心态应对全球化,并积极投身全球化,把它变成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契机。

事实上,在世界文化的各种样态之中,那些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文化类型,从来就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在文化交流与汇通中把握机遇,在危机中实现一次次“华丽变身”的结果。西方文化自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代技术革命、冷战后的两大文化阵营对立,一直到今天的危机时代(如前所述,虽然以金融危机形式爆发,但我一直认为这也预示着一种文化危机的开端),西方文化其实一直处于欧洲大陆文化与亚洲文化、古希腊众神与基督教文化的对立、冲突与融合过程之中。综观欧洲文化历史,每一次文化变革都产生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它曾发生自由与法制精神的博弈,一神与多神宗教的论辩,禁锢与启蒙思想的杀戮。200多年来,美欧之间也在发生着文化的互动与交融。欧洲文化曾滋养了美国文化,民主、制度、公平、正义等等这些源于欧洲的概念在美国日益完善,生根发芽。而今天,全球化的劲风之中,欧洲文化也受到美国文化的反扑和冲击。中国文化亦然,从佛教的进入,儒释道的融合,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到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传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等,每次文化革新都伴随着文化启蒙,都以文化自觉为基础,都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创生。

可见,古今中外,没有一种先进文化是毫不妥协地坚守本土文化的结果;它们总是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并把它转换为促动民族文化前行的动力。所以,诚如费孝通所言,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是“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

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7〕}

在以全球化为背景的中西方文化竞逐中,文化冲突常常是难以避免的,一方面应当尽量避免其发生;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推挡不掉的文化冲突,正确的态度是承认它,思考化解这些冲突的有效方法,并且在冲突中寻求自我文化的发展。我们应该探讨在承认和理解文化差异的前提下进行文化融合的方式与方法。以对自己文化的高度认同为基础,在尊重他人文化前提下,通过对话解决文化差异的问题。我们要发挥传统的文化精神,以宽容的心态理解他文化;以自强的精神展示和呈现己文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天地交,君子以辅相天宜”。没有这种自尊、自信与胸襟,全球化就不会成为复兴、壮大与创新中国文化的历史机遇,文化强国的梦想就不会实现。

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问题错综复杂,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问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西学东渐问题等等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极大地增添了我們进行文化创新的难度。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时时做到对当前文化的自省与反思,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克服文化创新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当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不能全然适应现代社会,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理路和逻辑差异明显,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也面临危机。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者都无法成为我们文化创新本体的情况下,探讨全球化语境之下三种文化的融会贯通之道,以积极乐观的心态为新文化的诞生创造条件,就显得极为重要。这种由三种文化的思想精华凝练而成的新文化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并非朝夕可成之事,但它承载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梦想,代表着具有充分文化反思意识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

(参考文献)

- 〔1〕〔2〕〔5〕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 〔3〕费孝通《从文化反思到人的自觉》,《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 〔4〕〔7〕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
- 〔6〕费孝通《文化的传统与创造》,《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侯小丰】